

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教育学）重点研究基地书系

主编 睦依凡



Nongcun Xuexiao Fuwu Xinnongcun
Wenhua Jianshe Yanjiu

农村学校服务新农村 文化建设研究

吴惠青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Nongcun Xuexiao Fuwu Xinnongcun
Wenhua Jianshe Yanjiu

农村学校服务新农村 文化建设研究

吴惠青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村学校服务新农村文化建设研究 / 吴惠青著.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7
ISBN 978-7-308-16051-3

I. ①农… II. ①吴… III. ①农村学校—关系—农村
文化—文化事业—建设—研究—中国 IV. ①G725②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8664 号

农村学校服务新农村文化建设研究

吴惠青 著

责任编辑 杨利军

文字编辑 余月秋

责任校对 张一弛 李增基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85 千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6051-3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http://zjdxcbbs.tmall.com>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新农村建设的社会背景	(8)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新农村建设回顾	(8)
第二节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	(19)
第三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新农村建设	(24)
第四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新农村建设的意义	(25)
第五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新农村建设的推动	(27)
第二章 新农村建设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融合	(32)
第一节 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内涵	(32)
第二节 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内容	(35)
第三节 新农村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联结	(39)
第四节 新农村文化建设需处理好的几对关系	(42)
第三章 农村文化建设的困顿	(45)
第一节 农村文化建设主体的结构性缺失	(45)
第二节 农村基础文化建设的集体性失语	(48)
第三节 农村制度文化的习惯性脱节	(54)
第四章 新农村文化建设中乡村教育改革的价值选择	(58)
第一节 乡村教育改革的功能性定位	(58)
第二节 影响乡村教育改革价值选择的因素	(61)

第三节	乡村教育发展的新逻辑	(64)
第五章	新农村文化建设对乡村学校的呼唤	(75)
第一节	乡村学校的归途之旅	(75)
第二节	记忆与期待中的乡村学校	(85)
第三节	乡村学校建设的机遇与使命	(90)
第六章	乡村学校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定位	(106)
第一节	乡村学校特色文化的创建	(106)
第二节	乡村学校在乡村教育改革中的文化发展	(115)
第三节	乡村学校文化创建的案例分析	(125)
第七章	乡村学校服务于新农村文化的课程建设	(128)
第一节	乡村学校服务于新农村文化的课程设计	(128)
第二节	乡村学校服务于新农村文化的课程结构	(138)
第三节	乡村学校服务于新农村文化的课程开发	(142)
第四节	乡村学校服务于新农村文化的课程评价	(156)
第八章	乡村学校服务于新农村文化的教学	(161)
第一节	乡村学校服务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教学目标定位	(161)
第二节	乡村学校服务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教学理念	(165)
第三节	乡村学校服务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教学方式	(170)
第九章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教师的文化担当	(179)
第一节	农村教师的文化责任	(179)
第二节	边缘化:农村教师的文化生存现状	(181)
第三节	农村教师文化责任的担当	(184)
第四节	农村教师文化责任的实现	(187)
第十章	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教师的文化养成	(190)
第一节	培养“为农型”的教师	(190)
第二节	发展“智慧型”的乡村教师	(195)
第三节	素质“教育型”的乡村教师	(203)
第四节	走近新时期的乡村教师	(209)
第十一章	新农村建设中乡村学生的文化反哺	(216)
第一节	乡村学生文化反哺的价值诉求	(216)

第二节	乡村学生文化反哺的基本内容	(224)
第三节	乡村学生文化反哺的实施过程	(231)
第十二章	新农村建设中乡村学生的成长体验	(237)
第一节	乡村学生成长体验的实质	(237)
第二节	新农村建设中乡村学生成长体验的形式	(242)
第三节	新农村建设中乡村学生成长体验实现的保障机制	(247)
参考文献		(254)
索 引		(263)

绪 论

我对农村学校生存、改革与发展的关注,最初源于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母校生存境遇的关心,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农村教育的期待和对农村学校生存命运的担忧。

我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市一个叫汤店的农村。在“人民公社”时期,村上设有7个生产队。在学校的布局上,以汤店村为轴心村,外加四个自然村组成一个学区。在这个当时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的乡村学校里,我读完了六年小学,两年初中。高中毕业后,又在这里担任过小学和初中民办教师。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来,广大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我的心目中,感受最深、变化最大的是我学习、工作了整整10年的学校。受众多因素的影响,先是初中部被撤销,并入镇里的中学,学校规模缩小,师生人数迅速减少。接着是小学高段,最终是包括小学一年级在内的整个小学并入离家2.5千米远的镇中心小学。至此,这座创建于20世纪中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的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走完了她终结命运的历程。昔日充满书香的校园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家替人代加工的服装加工厂。在这里,村民们再也看不到昔日学校操场上学生的嬉闹,再也听不到学生琅琅的读书声。还有上课、下课的铃声,也随之“销声匿迹”。而留下的就像有人描绘的那样:“早上的鸡叫,白天的鸟叫,晚上的狗叫。”带着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我曾多次驻足于学校的旧址,茫茫然似有所失,一连串的自我追问涌上心头:像眼前这样的农村学校是否已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类似于这类“全身而退”的千千万万农村学校来说,被撤并是不是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必然且唯一的选择。还有,学校的

迁址,从表面上看只是一种办学地点的变化,但其背后蕴藏的原因和由此而产生的影响,却可能远远没有如此简单。被“迁走”的书香校园、学生的嬉闹,还有读书声、铃声和歌声等文化“元素”的整体搬迁,是否会动摇我国农村教育的根基。在当前的社会转型中,是否会导致农村文化之树被“连根”拔起,“夹带”走对新农村建设,尤其是新农村文化建设十分重要的资源和合力。

带着诸多的困惑和担忧,我选择了新农村文化建设作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其中一个主要的间接动因是:源于对我国乡土文化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迷惘和彷徨。

迷惘之一: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这片生生不息的土地上,先辈们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乡土文化。穿越我国乡土文化发展的历史星空,感受我国乡土文化发展的时代脉搏。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对传统文化的基本面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具体而言,中华文化所特有的淳朴、仁厚的民风,天人合一的自然主义情结,趋福避祸的民间信仰,淡然的生活态度和乐观精神,艰苦环境中自强不息的顽强意志等文化“元素”,构筑了中华民族坚强图存的精神动力,表现出了中华文化的独特生命样式,形成了自然而独到的文化品格。然而,在由现代性开启的价值世界中,不知何时,面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交融与冲突,出现了一股对传统文化持简单化的虚无主义文化思潮。当下,在不少人的观念中,乡土文化被视之为要被城市文化“改版”,甚至于等待被取代的落后文化。并由此导致了乡村文化在文化重建过程中的缺位,原本应有的彼此“互动”,演变成了一出出“单面倒”的“独角戏”,于是也就有了“乡土的逃离”、“乡土的守望”、“乡土的回归”之说。文化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血脉,文化需要传承,需要听众,更需要参与者。一个缺少文化的农村是没有生机的,是缺乏活力的。综上所述,在漫长的农业社会,我们的先民们创造、积淀了光辉灿烂的农耕文化,并凝结、汇入我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追寻这条文化之河留下的历史印迹,我们发现,无数先辈们为人类创造的灿烂辉煌的文化,那些让中华儿女倍感自豪的文化之魂,中华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之源”、“文化之根”就在其中。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过去的是“过去”的,当人们在因拥有这种自豪感而得到心理满足之后,为了“今天”和“明天”,我们应该就此做出进一步的追问:上下五千年,那些曾孕育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之“根”如今还能焕发出勃勃生机吗?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中,为了中华文化

的复兴,我们应该如何去“寻根”,怎样去“护根”呢?针对以上的“追问”,我们希望对为什么要去开展新农村文化建设,应该建设怎样的新农村文化,如何去开展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研究中寻找、获取答案。

迷惘之二:

在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突中,农村文化几乎是全线“败北”,失去了阵地,失去了市场,失去了传人。伴随着电视、智能手机、VCD、DVD、卡拉 OK、电子游戏等大量涌入农村,在城市文化的影响中,诸多民间文化失去了市场,诸多民间艺术后继乏人。一些具有浓郁民族文化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皮影戏、木版年画、剪纸等都面临着逐渐失传的危机。而各地的民间刺绣、泥塑画、年画、书画、曲艺、民间文学等也都不同程度地陷入困境。而与此同时,乡村宗族文化、迷信文化泛滥。重续宗族族谱、维修重建宗祠、颁布宗族族规、开展联宗祭祖等乡村宗族文化活动日益复苏。建寺庙、设神坛,看风水、测命运、信巫师、跳大神等封建迷信也日益抬头。此外,一些“不良文化”在农村大有市场,神汉、巫婆、看相、算命等封建迷信活动也还时有出现。之于近年来在广大农村“死灰复燃”的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普遍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农闲时节,赌博现象更为严重。

教育与文化是“近亲”,面对当前农村社会在文化建设中存在的种种乱象,作者试图从繁荣农村教育事业,深化农村学校教育的视角,阐述自己对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认识,提出如何提升农村文化的观点和思考。

迷惘之三:

我确定以乡村学校作为研究对象,将乡村学校作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主体展开研究,还出之于当前我国大部分农村学校对新农村文化建设表现出来的“无作为”、“漠视”的态度。而我所期盼的是,希望广大的农村学校把自己当作新农村的一员,把自身看作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局内人。充分利用学校的文化建设资源,发挥农村学校、农村教师在新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中的“核心”作用。

我国的知识分子向来就有关心社会,以国家、天下为己任,亲身投入社会改革洪流的优良传统。当历史的车轮驶入近现代后,一些教育家和教育团体开始在我国进行农村教育改良实验,试图通过发展乡村教育促进农村社会的发展。涌现了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著名的乡村教育家。其间,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陶行知、晏阳初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均致力于乡村教育,并将乡村教育与乡村经济、文化建设结合起来。

陶行知提倡教育与农业携手,认为“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农业没有教育,便失去了促进的媒介。倘若好的农村学校,深知选种调肥,预防虫害之种种科学农业,做个中心机关,农业推广就有了根据地,大本营”。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普遍存在愚、穷、弱、私四大病症,主张实施“四大教育”:以文化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并在华北、华中、华西选点试验。梁漱溟也十分重视农村教育和乡村建设,主张通过教育培育新民,建设新村,进而实现强国之梦。上述教育家的农村教育改良主张,虽然在旧中国不可能真正实现,但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改革探索对现代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以及农民素质的提高具有借鉴意义。这一场发生在上个世纪初的乡村改造运动,为我们当今的农村教育改革,特别是农村学校服务新农村文化建设树立了榜样,提供了借鉴。有作为才能有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学校在农村社会中的影响力不但没有提高,反而越来越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学校对农村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助推作用发挥很少。而提倡、鼓励乡村学校作为文化建设主体的“身份”投身新农村建设,这对促进新农村文化建设,密切村校关系,推动农村学校的教育改革,提升农村学校在农村社会的地位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和理论价值。

“农村学校服务新农村文化建设研究”,是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的一个资助项目。本书记录了作者对乡村学校服务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思考和实践的探索,汇集了作者在该领域研究中的主要成果。全书分为十二章。前六章,侧重于对农村学校服务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调查、成因分析以及理论思考。后六章,侧重于对乡村学校如何去服务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与探讨。

第一章是“新农村建设的社会背景”。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从“行为驱动”的角度,把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实践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翻身做主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动员’驱动”;第二阶段为“‘摸着石头过河’——农村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驱动”;第三阶段是“‘文化型塑’——农村建设新时期的‘文明’驱动”,并对三个时期的特点和影响进行了分析与归纳。第二部分从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与发展的角度,较为全面地阐述了进行新农村建设的意义、必然性和重要性。第三部分在揭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助推新农村建设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如何去推动新农村建设的观点和思考。

第二章是“新农村建设与新农村文化建设”。分为四个部分。首先,从

解读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内涵入手,根据对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相关文件精神的理解,阐述了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目标。第二部分,归纳了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内容。第三部分,分析了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特点,明确了新农村文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第四部分,提出了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这几对关系的基本要求。

第三章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困顿”。新农村文化建设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在现有的农村文化建设基础上的重建和超越。本章内容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农村文化建设的脐带断裂”、“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缺席”、“农村文化建设的空间压缩”三个方面描述了“农村文化建设主体的结构性缺失”。第二部分,从“农村公共文化投入匮乏”、“农村文化生活参差不齐”、“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滞后”、“农民文化权益缺位”四个方面反映了“农村基础文化建设的集体性失语”。第三部分,从“熟人脉络的农村基层秩序”、“亚细亚色彩的农村伦理范式”、“不健全的农村文化市场体系”三个纬度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困顿进行了盘点。

第四章是“新农村文化建设中乡村教育改革的价值选择”。培养怎样的人的问题,是农村教育的根本问题。作者首先从做“践行新农村文化的新型农民”,做“致力于做‘土艺术家’的新型农民”,做“具有法治意识的新型农民”等三个方面对乡村教育的功能进行了定位。第二部分从“主体性的人的取向”、“所传授的知识的取向”、“教学生活的环境取向”三个影响要素进行分析。最后,引入“内卷化”的概念,针对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困顿,尤其是“为农”还是“离农”的取舍两难问题,采用由果循因以求解的内在逻辑,论证了“农村教育的价值选择”。

第五章是“新农村文化建设对乡村学校的呼唤”。本章内容分为三部分。首先,从“迷茫乡村的心灵求助”、“乡村学校与农村文化的背离”、“乡村学校的救赎之路”三个方面展示“乡村学校的归途之旅”。第二部分,从“历史记忆中的乡村学校”、“饱受期待的乡村教育实验”两个角度写出了在人们“记忆与期待中的乡村学校”。第三部分是本章内容的重点,从“承袭乡村社会的传统文化”、“传授城市社会的现代文化”、“联结与整合不同类型的文化”、“引导与催生农民的文化质变”、“重构与拓展农村公共生活空间”、“修复与重建农村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对乡村学校发出了呼唤。

第六章是“乡村学校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定位”。本章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从“乡村学校特色文化创建的意义”、“乡村学校特色文化创建的

原则”、“乡村学校文化建设的路径”、“乡村学校文化建设应避免的几个误区”等四个方面阐述了“乡村学校特色文化的创建”。第二部分,从“乡村学校文化与教育改革”、“乡村教育改革受阻碍的文化阐释”、“乡村教育改革中的农村文化重建”三个方面阐述了“乡村学校在乡村教育改革中的文化发展”。第三部分为“案例分析”。具体介绍了蒲江县成佳镇九年制学校的“茶文化”和河南省信阳市郝堂伟小学的“可持续发展型学校”创建的过程与经验。

第七章是“乡村学校服务于新农村文化的课程建设”。全章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从“乡村学校课程建设的背景与意义”、“乡村学校课程建设的理念”、“乡村学校课程建设的取向”三个方面论述了“乡村学校服务于新农村文化的课程设计”。第二部分,从“国家课程的校本化”、“乡土课程的情感化”、“校本课程的特色化”三个方面阐述了“乡村学校服务于新农村文化的课程结构”。第三部分,从“乡村学校课程开发的基本原则”、“乡村学校课程开发的程序”、“乡村学校开发的条件保障”三个角度论述了“乡村学校服务于新农村文化的课程开发”。最后,从“乡村学校课程评价的内容”和“乡村学校课程评价的策略”两个方面阐述了“乡村学校服务于新农村文化的课程评价”。

第八章是“乡村学校服务于新农村文化的教学”,全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基于‘离农’取向的教学目标”和“基于‘为农’取向的教学目标”提出了“新农村文化建设下的农村教学目标”。第二部分,从“民国时期的乡村教学理念”、“新中国成立后的乡村教学理念”定位新农村文化建设时期的乡村教学理念。第三部分,从“主体参与式教学的理论基础”及“主体参与式教学的意义”,结合主体参与式的教学案例及分析,描述了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教学方式。

第九章是“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教师的文化担当”。全章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了文化担当是乡村教师应尽的社会责任。第二部分,从“公共性的旁落”、“本土知识践行的缺失”、“文化素养不足”三个纬度,反映了“农村教师的文化生存现状”。第三部分,结合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与乡土教育的实际,具体介绍了“直接”和“间接”两种“服务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参与方式。最后,从“形成文化自觉意识”、“改革考核评价体系”、“推动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职前教育中加强‘三农’教育”四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实现农村教师文化责任担当的实践和设想。

第十章是“新村建设中乡村教师的文化养成”。本章共有四个部分。前

三部分从不同方面对乡村教师提出要求。一是对乡村教师提出要“以情待农”、“以意亲农”、“以信为农”、“以行奉农”，使自己成长为“为农型”的教师。二是要求乡村教师“提升思想意识层面的人文素养”、“打造知识技能层面的知行合一”，使自己成长为“智慧型”的乡村教师。三是要求乡村教师自觉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恪守依法治教”、“履行立德树人”，使自己成为一名素质“教育型”的乡村教师。最后，介绍了甘肃省华亭县山区教师刘霞老师“吃苦耐劳，坚守学校近三十年；充实自身知识，创造复式教学”的感人事迹。

第十一章是“新农村建设中乡村学生的文化反哺”。全章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学生主体意识的提升”、“‘好公民’的文化素养培育”、“民主的和谐校园构建”三个角度论述了“乡村学生文化反哺的价值诉求”。第二部分从“科学知识观”和“生活方式观”两个纬度阐述了“乡村学生文化反哺的基本内容”。第三部分，从“加强学生的文化反哺意识使其真正成为主体”、“家长需要转变观念来营造自由的文化反哺氛围”、“发挥教师的桥梁作用从而搭建反哺之桥”、“学校通过开展各种活动丰富文化反哺的形式”等四个方面论述了“乡村学生文化反哺的实施过程”。

第十二章是“新农村建设中乡村学生的成长体验”。全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三个角度揭示了“乡村学生成长体验的实质”。第二部分从介绍“新农村建设中乡村学生成长体验的形式”入手，论证了实践活动对实现乡村学生的体验价值和生命意义。最后提出了新农村建设中乡村学生成长体验实现的保障机制。

第一章 新农村建设的社会背景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宏观资源配置格局上一直采取以农补工、城市“优先”农村的政策。从某种层面来讲,新农村建设不算一个新概念,但我们可以通过对我国历次新农村建设的回顾有所体悟。当前,我国总体上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新阶段。“新农村建设”这一命题给我国的农村改革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使命,这也是时代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可以说,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工业化有了一定发展基础之后也都采取过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战略。当今,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已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非农产业,我国现在已经跨入“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可以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其产生的影响不仅仅限于“三农”本身,因而,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更加全面的要求。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新农村建设的回顾

一、“翻身做主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动员”驱动

我党历来重视农民参与革命与建设的积极性。早在民主革命建设时期,我党就开始实行各种土地革命政策,号召农民以“主人翁”的意识和责任

感来关心、参与、争取、保卫红色政权的建立与巩固。我党正是靠着对农民的组织、动员,才真正赢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战争年代所积累起来的“土地革命”经验,也成为日后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财富。

20世纪50年代,随着新中国成立,我党及时进行了土地改革,并根据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三大基本原则,进行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目标,坚持走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中心的集体经济道路。在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下,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大寨精神^①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挂帅、精神先导”,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人民希望迫切改变自己贫穷命运的强烈愿望。总体来看,这种群众动员策略在战争年代能够最大限度调动一切人力、物力,保证战争的胜利。但是在和平年代与自然、经济客观规律的互动中,表现出了对客观物质条件、客观经济规律的漠视。同时,这种源于外部理解的、典型的“强势社会阶层俯看弱势社会阶层”、以外部动员、宣传和外部引入为主的国家“符号殖民”过程必然导致农民自身创造性、主动性以及优秀传统文化的难以“承继”。^②

但同时我们也要客观、理智地认识到,“动员”驱动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如下的特点与影响:

(一)农民追逐自己真实需求的刺激不足

在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的时代里,“政府计划”往往会导致农民真实需求的遮蔽。当时的状况可概括为:城乡发展以城市为中心、以工业为重点,城乡二元结构逐渐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缓慢。在那个时代里,在对乡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人民公社化”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集体经营、按劳分配,它不仅成为一种土地所有制度,而且成

① 1964年2月1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第一次代表中央概括了大寨精神: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对大寨精神作了高度概括:“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资料来源《农业学大寨始末》)

② 李小云:《文化符号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理论创新与实践反思》,转引自李小云,赵旭东,叶敬忠.乡村文化与新农村建设[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30-36.

为一种分配形式。导致的结果是,农村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产业之间、农业内部不能自由流动,政府的计划调拨和交换成为主流。

这一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农民干什么、什么时候干、为谁干,都不是由自己做主。在集体生产的粮食中,国家拿走多少,集体留下多少,对留下的劳动成果如何分配,最终农民能分到多少,生产这些粮食的农民都没有发言权和分配的决定权。当农民意识到自己的劳动成果不能自己做主,而是按照“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形式进行统一分配的时候,当他们中的许多人还经常被笼罩在饥饿的阴影的时候,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难得到维持。

(二)传统伦理与革命话语的复杂交织

费孝通曾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进行过概括,认为中国的乡村社会具有乡土性与熟人社会特点(费孝通,1998)。由于传统农村“家族式”的生产方式、居住方式、组织结构等,农村基本上是熟人社会,当时传统的乡村伦理(比如尊老爱幼、孝顺、朴素、节俭、吃苦耐劳等)维系着农村基本的人际互动关系。在习俗的规范下人们彼此信任。这些优秀的传统乡村伦理需要在特定环境下才能保存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以其无产阶级先进性和创造性,继承并发展了传统伦理中的精华,在带领人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与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接受群众监督、自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公无私的干部工作准则。密切的干群关系也对农村集体的社会道德风气形成了积极的正面引导。江泽民总书记曾指出:“我们党的一大长处和优势,就是把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同坚持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讲求共产党员个人的思想品德修养。”^①在此,传统伦理与革命话语有着复杂交织的关系。这也道出了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上,发展农村各项文化事业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艰巨性。

(三)二元对立的城乡关系

世界上的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总是与农业劳动力逐步减少,农村人口数量逐步下降相依伴。在我国,首先,1953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后,由于国家投资增长过快,积累与消费、

^①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622-623.

市场与计划、农业与工业的矛盾突然以农副产品供应短缺的形式表现出来。^① 由于粮食供应紧张,人口迁移出现了一定的盲目性。其次,为提高农业积累,我国 1955 年开始实行户籍管理制度,户籍与国家计划资源控制连在一起,使不同户口类型的人享受不同的国家福利,由此产生的重大问题是农民与国家社会福利无缘。城乡之间自由的人际流动更被人为地隔断了。

农民无法自由地出入城市寻找工作与就业机会,城市也失去了进行各行各业建设的富余劳动力。城市化的推进缺少了自然的发展。在二元封闭的城乡关系背景下,乡村农民固守在封闭、保守、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集体无意识”之中。而代表城市文明的平等意识、公平意识、自由意识、竞争意识却无法在农村居民的狭隘意识中成长。二元对立的城乡关系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四)农村学校开始出现“逆知识化”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加大了小学教育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力度。乡村学校除了对适龄儿童进行正常的文化教育(语文、数学、美术、劳动教育)之外,还承担了对成年男女进行“扫盲”教育的重任。乡村学校与乡村社会主义建设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互动关系。浓厚的政治色彩成为当时学校教育的重要特色之一。

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对教育领域造成了严重的摧残。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学生开始走向田间地头,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冲击,学生的厌学、逃学、弃学现象开始不断蔓延滋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停止了高考,阻滞了学生求学上进的途径。“文革”开始,首当其冲是高等教育,高考制度的废弃和大学的停止招生,粉碎了许多农村青年的大学梦。另一方面,教学内容简单化、政治化。如,“文革”初期,有不少的小学把《毛主席语录》作为唯一的教学内容,把诵读《毛主席语录》作为主要的教学方式,使得教学内容走向简单化、政治化,教学方式变得日益粗暴、机械。农村学校教育的“逆知识化”成为当时农村教育衰败的重要表征。

二、“摸着石头过河”——农村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驱动

正是在对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过于公有化、集体化、教条化的农村经济管理体制的反思下,我国农民开始有了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自觉反思与利用。正是政府上层无法找到具体有效的农村经济改革的方式,我国底层人民的

^① 武力. 1949—2006 年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J].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7(1).